

十三經注疏

周禮注疏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禮

[漢]

鄭玄

注

[唐]

賈公彥

疏

彭林

整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0
(十三經注疏)
ISBN 978-7-5325-5070-8

I. 周… II. ①鄭…②賈…③彭… III. ①禮儀—
中國—古代②周禮—注釋 IV. K224.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33088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十三經注疏

周禮注疏

(全三冊)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彭林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c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56.5 插頁 18 字數 1,682,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978-7-5325-5070-8

K · 1149 精裝定價: 22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T: 66511611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

顧問

(按姓氏筆畫爲序)

任繼愈 李學勤
湯志鈞 蔡尚思

主編

張豈之

王興康 金良年

副主編

周天游

執行編輯

王立翔 呂健

責任編輯 李祚唐

美術編輯 嚴克勤

技術編輯 富強

校對人員 俞麗敏 侯奇偉 楊思華等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

張豈之 周天游

《十三經》是儒學的基本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影響至深至遠的重要文獻之一。在中國古代，堪與《十三經》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對這兩大文化支柱，無論是諸子還是詩文，其中雖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歷史舞臺的邊緣，難以撼動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二十四史》是以記實爲本，縱貫古今，鑒往說來，宣彰資治，更多發揮的是實用的鏡鑒的作用，那末《十三經》則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靈魂。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設立五經博士，立於學官之後，直至清代，經學一直是歷代統治者製定國策的理論依據，是士農工商各色人等齊家立身的行爲規範。不僅如此，《十三經》還被法典化，於是有了「春秋斷獄」，「禮」成了「禮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於是儒學成爲國學、國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廣到所有官私學校之中，又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包括目不識丁之人在內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的思想與行爲。所以每當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之際，總有人視其爲障礙，爲糟粕，必欲除之而後快；相反，也有人尊之爲聖典，爲良方，藉其足以安邦定國。時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從這一意義上講，不了解十三經，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中國。特別是上世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後，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除舊迎新的作用，經學的地位開始一落千丈。然而正如在倒掉髒水的同時也倒掉了嬰兒一樣，十三經中的精華也同糟粕一道被棄置，殊為可惜。更為可怕的，其中的許多糟粕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又往往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為害社會。所以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中華文化遺產更加珍視，開始呼喚讀經，呼喚科學的讀經，呼喚經學研究者在嚴謹的批判與借鑒中，讀懂十三經，使經學中的合理內核與有益營養，跟現代社會達到真正的和諧與交融，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正是基於此，我們才萌生出整理出版新版十三經注疏的最初願望。

「經」本指經綫，是布帛等織物的綱，並引申出提綱挈領、傳之久遠的含義。於是作為基本典籍常相傳授的書，便被稱作「經」。「經」本非儒家典籍所專有。最早被稱為「經」的書是墨經，也就是墨子。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此外，管子、韓非子也稱為「經」。儒家之書被稱作「經」，也始於戰國，那就是「六經」。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湖北荊州郭店所出竹簡中所記「六經」經名與順序，證莊子所言不虛。這「六經」的順序保持到西漢前期。(一)

「六經」是夏商周三代禮制文明的結晶，大體成型於周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上下陵替。隨着周王室的衰敗，「六經」也失去往日的榮耀，被棄之不用。而諸子百家乘勢而起，為新興的貴族出謀劃策，

變法圖強。孔子尊崇周制，潛心整理「六經」，試圖恢復周禮所提倡的等級秩序，以平息紛爭，因逆潮流而動，便到處碰壁，甚至陷入「惶惶若喪家之犬」的境地。當時，儒學並非顯學，「六經」也不神聖。秦併六國，天下歸一。秦始皇以法立國，一度焚書坑儒，儒家又遭沉重打擊。幸賴秦博士所藏及民間所匿，於漢初衆經才得以復出，而樂經已亡，僅餘「五經」。漢武帝之時，國力達於極盛，新的統治秩序得以鞏固，赤裸裸的法治或清靜無爲的黃老之學無法滿足新秩序的需要，從此神學化的儒學脫穎而出，登上獨尊的國教地位。兩漢之際，「六經」順序有了微妙變化。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所刊爲：「易、書、詩、禮、樂、春秋」。這順序沿用至今。而之所以有此改變，可能與劉向、劉歆當年整理文獻排列諸經成書年代次序有關。東漢時，加入了論語、孝經，除去已佚的樂經爲「七經」。唐時有「九經」之說，未見確論。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言，至唐文宗太和年間（八二七—八三五）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有了實指，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了宋代，經朱熹等理學家的推崇提倡，孟子進入「經」的行列，於是「十三經」始全。

「十三經」的成書年代，至今爭論不休。然而易經、尚書形成於西周；詩經始於西周而成於春秋；儀禮、周禮、禮記基本編定於東周，漢代有所變更；左傳、論語、孟子、爾雅成書於戰國；孝經古本完成於戰國，而改定於漢初；公羊傳、穀梁傳寫定於漢代，基本內容源出於孔子弟子之說，還是大體可信的。

中國經學的研究，從漢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之久。西漢時期，今文經控制學壇。王莽代漢，古文經學抬頭。進入東漢，更一發不可收拾，經馬融、鄭玄等大家的推動，經今古文合流，但古文經處於上

風。魏晉學術爲之一變，玄學成爲顯學。而到了唐代，漢學重新流行，並以古文經爲基礎。宋時疑古之風大盛，理學一統天下，至明而不墜。清代則提倡樸學，輕虛言，重實證，追本溯源，漢學由是復興，經學研究也達到頂峰。那時相關著作，接踵問世，如納蘭性德匯刻之通志堂經解、阮元輯刻之皇清經解、王先謙輯印之皇清經解續編，動輒收書數百種，總卷帙超千卷，其他專著則數不勝數。當然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且久的，仍當推阮元主持修訂的十三經注疏。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享年八十六歲，謚文達。據清史稿阮元傳所載，「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勅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爲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撰提要。」又曰：「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在浙江立詁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爲科律。」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刊成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可謂神速。不過其準備工作則在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在浙江創辦詁經精舍之時，當時他糾集段懋堂、何元錫、顧千里、徐新田、臧在東、孫雨人、李尚之、嚴厚民等知名學者，分撰十三經校勘記，奠定深厚基礎，所以新本一出，倍受歡迎，享譽至今。

阮刻本雖稱善本，却並非無懈可擊，其存在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選用底本不當。阮刻本以「重刻宋本」爲名，實際所用乃元刻明修之南雍本，此本雖原出宋季建刻附音本，遞經修補，續有糾譌，然轉相承訛之處多有，阮校因之失誤之例甚多，因此，實非整理首選。相反，始於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刻本之周易、尚書、周禮三種，繼以紹熙中黃唐刻毛詩、禮記二種，因半葉八行，故稱八行本。而經注及義疏合刻始於是本，書名題有「注疏」之稱，亦始於是本，勘刻之精審遠在十行本之上。以周禮、禮記爲例，因十行本錯而八行本不誤，阮刻校勘記可以不出者，大約在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卷無例。如尚書依正義作二十卷，儀禮依正義作五十卷，而周易則依經注本作九卷，與正義作十六卷異。又毛詩也依經注本作二十卷，却非正義作四十卷之舊。或依或違，所爲無定，遂使唐宋義疏原卷不可得以詳。

三、主事者意見不合，各執己見，勢同水火，正確建議未能採納，而致謬種流傳。如顧千里與段懋堂之爭，事涉臧在東、何元錫二人，以至顧氏出走，爲張古餘刻儀禮注疏，以成己志。

四、急於呈送，校對未精。因阮元陞任兩廣總督，江西之盧宣旬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二)

有鑒於此，西北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發起，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的編纂委員會。編委會草擬了有關的方案與體例，並約請國內十餘名中青年才俊，參預點校整理工作。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採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

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但由於種種原因，有關工作遷延至今，這是我們深爲遺憾之處。

又當代缺乏經學大家，是客觀事實。今預役諸君各有特長，成果頗豐，但均有先天不足，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本項工作一直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〇〇八年八月修訂

〔一〕參閱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楊伯峻經書淺談導言、周予同經學歷史序言、李學勤經史總說，下同，恕不一一注明。

〔二〕見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載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又參閱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載文史第三輯。

校點前言

周禮一書，舊題周官，始出於西漢景、武之際。全書分爲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冬官原闕，時人以考工記補之），分掌治、教、禮、政、刑、事六典，經邦治國，變理陰陽，堪稱文繁事富，體大思精，治術、學術無所不包。但是，此書在先秦典籍中不見徵引，所記制度也每每有與文獻抵牾之處，因而，關於它的真偽及其成書年代，成爲西漢以來聚訟不決的著名學術公案，或譽爲周公之典，或指爲戰國遺則，或斷爲秦漢之制，或貶爲新莽僞作，紛紛之論，莫衷一是。然而，論辨的諸家都不否認周禮的學術價值，因爲它最遲也是漢代的作品，材料之珍貴，自不待言，問題在於從什麼角度來使用它而已。

周禮屬於古文經，在今文經獨盛的西漢，它曾受到激烈的排斥。劉歆是治周禮的第一人，他認定此書是周公手澤。由於他的奮爭，周禮在王莽時被列入禮經，取得了與儀禮等今文經平起平坐的地位。東漢初，劉歆的弟子杜子春設席授業，傳習周禮，其學大盛，注家蜂起，爲周禮作解詁的學者，如鄭興、鄭衆父子，以及衛宏、賈逵、馬融等，皆一時之選。到東漢末，經學已陷入煩瑣之境，師法家法林立，學者分門角逐，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後漢書鄭玄傳）。有鑒於此，經學大師鄭玄乃會通今古文之說，刪裁繁誣，刊改漏失，遍注羣經，周禮注就是其中的一種。鄭

玄的周禮注，比勘今古文異本，審辨錯簡譌字，疏解名物，暢通經意，凡有異說處，必擇善而從，使學者知所歸往。全書簡約易守，體現了漢代周禮研究的最高成就，深為學術界所推崇，其後，無論政權如何更替，學脈如何分派，它始終是周禮學的不祧之祖。

周禮學的另一位功臣，是周禮疏的作者賈公彥。賈公彥的生平，舊唐書儒學傳語焉不詳，只有寥寥數十字的記載，我們由此而知他是唐洺州永年（今河北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又據禮記正義序，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時，賈公彥曾參與禮記正義的撰寫。此外，他還主持完成了儀禮正義的撰作，足見他是一位精於三禮之學的學者。賈公彥對周禮學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對六朝義疏的是非得失，作了系統的清理。六朝是禮學昌盛的時代，名家大著，層出不窮。禮學大師，南有雷次宗，北有徐遵明，聲名都堪與鄭玄相匹敵。崔靈恩的三禮義宗、戚袞的三禮義記、熊安生的周禮義疏、禮記義疏、劉獻之的三禮大義等，都是煌煌巨製。但是，諸家在對經注的理解上，也產生了新的分歧，並為之紛爭不已，影響了經學的發展。賈氏爬梳諸說，定於一尊，從而使學術思想得以統一。第二，鄭玄之注，語多簡略，又多夾雜漢制漢語，時移境遷，唐人已不易通讀，賈氏旁徵博引，窮本究源，一一疏通，對於充斥全書的器物度數之類，疏解也很明晰，因而有「發揮鄭學，最為詳明」之譽。第三，對經注的難解之處，每每發凡起例，使讀者能持簡馭繁，以此概彼，而貫其會通。賈公彥的周禮疏取材宏富，取舍得當，體現了唐代經學的最高水平，因而歷來為學者所重視。朱熹說「五經中，周禮疏最好」（朱子語類卷八六），是很中肯的。

順便要提及的是，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述董道廣川藏書志之說，以為賈疏源出於晉陳邵的周官禮異同

評與梁沈重的周官禮義疏二書。陳、沈二氏的書目，見載於隋書經籍志，原書早已亡佚，僅有輯本，今已難以質證，姑錄於此，聊備一說。

周禮鄭注、賈疏，是周禮學的雙璧，但直到北宋末，兩者一直是各自單獨刊行的。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馮道主持刊刻五代監本九經，此書依唐開成石經句度移錄而成，不含箋注，其中的周禮，是最早的「單經本」。到了宋代，開始出現經文下附有注文的「單注本」，以及只有疏文而沒有經注的「單疏本」。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提到的京本、監本、蜀本、潭州本、婺州本、建州本等，都屬於單注本之列。宋室南渡之初，始有人將經注與疏合刻，以省兩讀，從此而有「注疏」之名。其後，又有將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散附於各經之下的，故又有「附釋音注疏」之名，這種刻本極便於讀者，故流傳最廣。最早的附釋音周禮注疏，是南宋建刻附釋音十三經注疏本，因其版式為每半葉十行，故又稱「十行本」。明嘉靖中，李元陽於閩中用十行本重刻十三經注疏，是為「閩本」。萬曆中，北京國子監又用閩本翻刻，是為明「北監本」。崇禎中，汲古閣毛氏又用北監本翻刻，是為「毛本」。如此輾轉翻刻，魯魚亥豕，謬誤日甚。乾隆四年，武英殿參稽諸本，校刻十三經注疏，雖多所是正，但不能盡掃落葉。清代經學名臣阮元有感於此，遂會集有關學者，重行校刻十三經注疏，並於嘉慶二十年在南昌府學開雕，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即其一。阮氏以其文選樓舊藏南宋建本附釋音注疏（即「十行本」）為底本（據日人長澤規矩也考證，阮氏所藏諸本非宋世原刻，皆係元代建刻坊本），十行本為閩、監、毛諸本所自來，錯誤自然要少得多。阮本糾正了許多翻刻中出現的錯誤，又在考證的基礎上，訂正了原書中不少譌、脫、衍、倒的錯誤，使全書的面貌為之一新。阮氏此舉頗有功於學界，阮

本也因此成爲最通行、最有影響的版本。

遺憾的是，阮本並沒有成爲嚴格意義上的善本，主要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校對不精。在阮本尚未校刻完竣之時，阮元即奉旨由江西巡撫調補河南巡撫，校書者遂生懈怠之心，以至出現了監、毛本不誤而阮本反誤的現象。校勘記的取舍也不盡得當。因此，阮元之子阮福說「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爲善也」（雷塘龔主弟子記）。可見，阮元本人也不滿意此本。其二，底本不善。阮元以家藏十行本爲底本，認定其爲「諸本最古之冊」，其實不然。黃唐禮記正義跋云：「六經義疏，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閱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正義如前三經匯編。」紹熙辛亥爲一九一一年，此年黃唐萃刻毛詩、禮記兩經注疏。據黃跋可知，萃刻周禮等三經注疏早於此，刊印的具體時間未言及，版本學家多推定在高宗紹興年間，即宋室南渡之初，這是最早的正經注疏萃刻本。黃跋提到的刊刻周禮注疏等的部門是「本司」，即兩浙東路茶鹽司。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刻於浙江，故或稱「越本」；其版式爲每半葉八行，故又稱「八行本」。越刊八行本早於建刊十行本，另一個硬證是卷數的不同。新、舊唐志所錄周禮疏（單疏）都是五十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所記皆同。南宋所刊單疏舊版，卷數都與北宋相合，八行本正作五十卷。十行本併爲四十二卷，且附陸氏釋音，足見其晚出。此外，八行本雖爲注疏合刻，而仍稱「周禮疏」，是注疏本初起，尚無「注疏」之名，故猶蒙單疏之名。首頁題「周禮疏賈公彥序」，不作大字，也是單疏本的舊貌。兩者相較，孰先孰後，毋須贅言。今以八行本校阮本，阮校所訂之誤，而八行本不誤者，比比皆是。阮本校記繁冗，根本在底本不善。以八

行本校諸本，時有諸本皆誤，而惟獨八行本不誤者，益見其可貴。

宋槧八行本周禮疏的書版，至元、明猶存，元西湖書院所藏「周禮注疏書版」，即此。明初，版入南雍，其間遞有修補，但印本傳世絕少。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元遞修八行本周禮疏五十卷，原爲結壹廬朱氏舊藏。此本雖爲足本，而原非一帙，其中卷十八、廿一、廿三等三卷，紙色迥異於餘卷，上有朱色圈點，且有「晉府圖書」之印記，因知其本爲明初內府藏書。查文祿堂訪書記，有八行本周禮疏卷七、四十七、四十八等三卷，也有「晉府圖書」印記，可知此六卷本爲同帙，而從內府逸出者。清內府也藏有八行本周禮疏，康熙年間，何焯校周禮注疏時，「曾見內府藏宋版注疏本」（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然而中祕森嚴，連顧廣圻、黃丕烈、阮元、錢大昕等都無緣一見。辛亥革命後，清內府藏本悉歸故宮博物院，一九四九年移往臺灣，不知何故，八行本周禮疏今已下落不明。所幸的是，一九三六年，董氏誦芬室曾從故宮借出此本影刻，斯文不滅，實屬萬幸。然董氏於文字時有訂改而無校勘記，稍失宋槧原貌，是其不足。此外，尚有李盛鐸藏殘本，僅存卷一至二、十三至十四、廿七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共二十七卷，有「臣筠」、「三晉提刑」、「尚寶少卿袁氏忠徹印」、「尚寶少卿袁記」等印記。此本孫詒讓撰周禮正義時即已聞知，「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本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周禮正義略凡例十二），可見也秘不示人，世人不易得見，此本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

本書以國家圖書館藏八行本周禮疏五十卷爲底本。此本爲足本，未經訂改，猶存宋槧規模及舊觀，版刻頗精。書中錯誤，大多出在補刻處。避諱字止於高宗構，而注疏中偶有及於孝宗慎者，曰人加藤虎之亮

認爲，避「慎」處皆補刻，書中「慎」字大多不闕末筆，故斷定此版刻於南宋孝宗朝。而中國學者多斷在高宗朝紹興年間。兩說相較，似以加藤說爲優。本書校勘記，儘可能吸收阮校成果，以存其是。經文的校勘，以唐石經及蜀石經殘本爲主，以諸宋單注本爲輔。鄭注的校勘，阮校本以嘉靖徐氏本爲主，徐氏有嘉靖三禮刻本，然而徐刻三禮以儀禮爲最善，周禮則錯誤甚多，前人已有定說。今以婺本、建本取代徐氏本。婺本即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因鐫刻精審，避諱謹嚴，且刻於南宋之初，版本家譽之爲「寶中之寶」，今國家圖書館藏其完帙一部，原爲海源閣楊氏藏宋槧「四經四史」之一。此本在清代已罕見於世，故博學如阮元也未曾得見，其版本價值遠高於徐氏本，自不待言。建本即南宋建安刻周禮鄭注十二卷，也是完帙，黃丕烈曾校正諸本周禮注之譌誤，驗之建本，則十之八九與黃說相合，彌足珍貴，此本也爲阮元所未見。賈公彥疏之校勘，則以阮本爲主，而以諸本參校。

八行本周禮疏原不附釋文，爲方便讀者計，今依阮本體例，將陸氏周禮音義二卷散附於經注之下，前用○號標示。陸氏釋文的傳刻本，流傳最廣的是徐乾學的通志堂本和盧文弨的抱經堂本，二本同出於明末的葉林宗鈔本，而葉本又出於錢謙益絳雲樓藏宋本。徐、盧二本雖經衆多學者訂正，仍有未盡之處，非最佳之本。今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內府藏宋槧元修本釋文爲底本，而參以徐、盧二本。國圖藏釋文，深藏天祿，清儒皆未之見。此本與錢氏絳雲樓藏本雖同爲宋本，而非出於一版，以之校徐、盧本，適足見其優於二本。陸德明作釋文時，所見周禮經注之本，與賈公彥所見之本不同，故文字每有歧異。宋人不明此理，遂妄加改易，以求統一，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盧文弨重雕經典釋文緣